



西学文库

本与末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
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王大庆 著



商务印书馆

西学文库

本 与 末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
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王大庆 著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王
大庆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西学文库)

ISBN 7-100-04743-9

I. 本... II. 王... III. 经济思想—对比研究—中
国、古希腊—古代 IV. ①F092.2②F095.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68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承希腊友人瓦西利斯·C. 康斯坦达
科普洛斯船长及其家人资助出版

BĚN Yǔ MÒ

本 与 末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王大庆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743-9/K·881

2006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18.0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从经济思想入手，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本末观”进行了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层次：(一)各家各派思想家的“本末观”之间的比较；(二)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思想家的“本末观”之间的比较。同时，本书以中国的“本”和“末”及其相关的三对伦理学和哲学范畴，即“义”与“利”、“公”与“私”、“善”与“恶”作为主要的参照系和分析的出发点，并从古希腊思想家的论述中发掘出相同或大体相当的范畴，进行了比较研究。

西学文库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持

- 《西学研究》（第一辑）
- * 《西学研究》（第二辑）
- 《拜占廷帝国史》
- 《希腊化研究》
- 《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 * 《波兰通史》
- * 《民主是由希腊人创造的吗？》
- * 《西方的兴起》

- * 为即将出版

Sponsored by
CAPT.VASSILIS C.
CONSTANTAKOPOULOS
AND HIS FAMILY

序 一

刘 家 和

若干年来，随着文化热兴起的学术趋向之一就是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当然，在比较研究中，可以选择的课题内容方面很多，研究的具体方法也各有特色，结论自然也不尽相同。充分的百家争鸣，对于学术的发展无疑是具有促进的意义的。

近代以来，中西历史文化的区别是尽人皆知的。百余年来中国备受列强侵略的痛苦经验，更加深了人们对于这种区别的印象。区别在近代，而区别的原因何在？于是，人们就向古代去追本溯源，进而见仁见智，立异标新，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这一切在研究过程中是十分自然的。如果细心观察，那么不难发现：在研究与讨论过程中，最容易引起轰动效应的是一些判别分明、文辞华采的作品，而比较难以引起注意的却是一些深入具体研究、潜心辨析异同的文章。这从一般读者的心理上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不过，从问题的深入与解决的角度来说，毋宁是后一类作品更具有比较实在的意义。

王大庆博士的《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一书，应该说是属于后一类的作品。

大庆此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古代中国与希腊的经济思想问

题。这个问题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可能不是问题。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古希腊的经济是工商业发达的经济,而中国的则是农业经济;古希腊人重视工商业,而中国人则重农(本)抑商(末)。正是在这样的似乎不须再加论证的认识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所谓“蓝色文明”、“黄色文明”这样的看似鲜明而实难准确的说法来。可是事实远非这样简单。历史事实是,不论在古代希腊还是中国都有农业和工商业经济,也都有对于农业和工商业作用的不同认识。研究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中、希之异中见其同,并由其同中见其异。大庆此书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下了工夫。大庆在就中、希双方的本末观及其所由以发生的经济和社会作了比较研究之后,说明双方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说明重商与农本两种经济类型乃是近代发生之事,并非亘古如斯。这些研究取向,应该说是可取的。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大庆此书也有其值得称许的一些特点。

第一,既然是历史学的研究,首先就不能不在原始史料上下工夫。大庆此书在作任何分析或评论时都必以原始史料为基础,而征引原始史料又必读其原书,了解引语之上下文,避免断章取义;必不得已而转引自他书者,则必说明转引出处,不敢掠人之美,亦不敢自欺欺人。引用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凡有语句可斟酌处,皆必参考多家注疏,于文字校勘、词义训诂、词气审度皆必求其妥善而后。因为,非如此不能真正作到与古人之“对话”;自己尚未明晰古人之言,如何能够论其原意?对于古代希腊史料,因古文字水平之局限,只能转引自英文译本。不过凡有多种译本者,皆必尽力找到,比其异同,务求避免理解失误;能有专门注释者,则必参考注家之讨论,庶几理解接近原文之真。大庆读书勤奋、谨慎而肯深思,在这方面是十分努力的。

第二,大庆此书很注意前人对此问题之研究成果的探讨。不论古代希腊经济思想史还是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前人已经有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在研究只有站在前人成就的“肩上”——以其研究的积极成果为基础,而解决其遗留之问题——才能谈到有所创新。大庆在汉文文献的参考虽不能说竭泽而渔(现在作品量大,已很难这样作了),但主要书、文务求经眼;至于外文文献,则唯尽心尽力而求之,不能求其备了。

第三,大庆此书的中心内容为经济思想史,不过又不是仅就经济思想而论经济思想,还注意从经济史、伦理史、哲学史的角度来探讨经济思想。因为,不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希腊,其经济思想总是受到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以及伦理观念、哲学思路等方面的程度不同的影响的。这样,他就不能不涉猎有关学科,受其启发,学其方法,在更广泛的领域里作多方面的比较的探索。这样的探索要做到炉火纯青,那是非常难的;不过,大庆此书在这方面能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也是值得赞赏的。

大庆潜心于世界古代史有年,曾从郭小凌教授治古代希腊经济史,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来又从我为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之学,在中国古典研读方面很刻苦钻研,也有长足进展,希望也祝贺他在此书以后能继续有中外古史比较之作问世。

刘 家 和

于北京师范大学寓庐愚龠

2004-8-16

序 二

郭 小 凌

王君大庆的著作《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即将面市，嘱我作序。我与他有同行、朋友与师生之谊，自然情无可却，于是爰赘若干实话如下：

我认识大庆是他到北师大历史系攻读世界上古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时开始的。入学后不久，他便显露出一位优秀史学工作者的出色潜质：能够长时间地坐冷板凳，不仅专心于啃书本，背外语，而且勤于思、敏于行，注重史学理论思维的训练，从而为掌握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古代史的基本功（熟悉经史、外语、史学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是我看好他的原因之一。

学生时代的大庆为人温厚、谦和，处事沉稳、冷静，不胡夸己长，也不妄斥人短，颇有些少年老成，是个具有古希腊人所欣赏的中庸或节制美德的学生。我觉得对于未来以求真求实的历史学为业并在专业上可能成气候的人，中庸或节制的涵养即使不是绝对必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因为这个职业特别忌讳感情冲动、偏执一端、逢迎时令、以偏概全之类“理性上的失控”（亚里士多德语）。大庆年纪不大，便有这般涵养，这是我看好他的原因之二。

后来他进一步师从刘家 and 先生，得到治中西古史基本方法的

真传,思想与功力渐趋成熟。这一选择对他的学术生涯至为重要,因为学习历史同学习其他学科一样,除了需要学生个人的天分加勤奋之外,还需要合适的老师指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名师出高徒”。这是我看好他的原因之三。

就天分(资)和勤奋而言,勤奋也许对史学更为重要,盖因史学无论随着时代需求发生怎样的变化,却始终变不了求真求实的实证学科的本质,只能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有九分史料不能说十分话。史料是史学的基础,譬如砖瓦之于高楼大厦。因此掌握更多的史料,成为构建史学大厦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在浩瀚的史料海洋里徜徉、搜集、爬梳、求索,是历史学人的工作常态。这种工作更多地需要时间和精力上的慷慨投入,并不需太大的智慧。所以,一等天分的学生若没有坐功,很可能只能出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史学成果。相反,二等天分的学生如果刻苦用功,则可取得一流的成就。大庆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但较强的智力加超人的勤奋却使他如虎添翼,胜过了不少原本看上去似乎很有前景的学生。

当然,指导教师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大庆博士生阶段的恩师刘家和先生学贯中西,不仅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学者,而且是循循善诱、为人师表的好教师。在刘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大庆一步一层楼,在中西古代经济史领域辛勤耕耘,终于推出了心血的结晶。这部著作的“底片”正是他在刘先生指导下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古史比较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领域,深入比较,特别是进入考据层次的比较,需要扎实的中西古文字、现代文字和文献解读的基本功。在中西古史领域,精通一头就需穷毕生精力,两头兼通谈何容易。也因为如此,我们以往看到的有关比较文章或论著,多系大

面上的共性、特性的泛论,缺少局部精细比较基础上的有力概括。即使有些集中于某个专题的类比,也沉不到中西典籍的底部,给人游说无根的感觉。大庆则充分调动自身已有的资源,知难而进,从古代中国与希腊两地的“本末观”这一基本观念入手,一头扎在先秦与古希腊诸子的著述之中,不仅分析两地知识精英对同一事物的相同相异的认识,而且注意一地内部认识的异同,并进一步探索两地本末观念产生的特殊原因和一般原因,所著达到了优秀史作所必需的史料翔实,论证周密,立论谨严,表述规范的要求,可以说是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我为大庆取得的成果击掌叫好。

当然,人都是有局限的,大庆在论述上的片面和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用肉眼挑他文中的毛病,能找出几十处表述不圆熟、思考不周全的地方;倘若用放大镜挑,起码能找出成百个毛病;如果用显微镜“吹毛求疵”,可能缺点会增加到成千上万个。我这样讲,一方面是希望大庆不要自满,个人治学的道路还很漫长,甚至没有止境,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说他所以比别人聪明,原因是他认识到了自己无知,世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并努力寻求知识。所以任何骄傲自负的观点都是非常可笑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人无完人和学术宽容的道理。如果一位作者有认真探讨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并且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工作,著述符合基本学术纪律,那么他的成果中即使存在一些史料误读或结论失误的地方,也是正常的。谁没有失误或看走眼的时候呢?任何论文或论著(粗制滥造者不在其列)有错都是正常的,不出错反而是反常的。现代史学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认识到史学认识的局限性,这就是史学工作者不仅在复制或记录、解释历史,而且在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始终处于自觉不自觉地犯错误的过程之中。不断认

识前人或今人(包括自己)的错误,不断改正错误,又不断犯错误,这种否定之否定恐怕是人类认识史的永恒特征。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节制和中庸,温厚与宽容,不只在做学问上,而且在做人上。拉杂写来,是一种感慨也是一种期许。是为序。

郭 小 凌

2004年4月3日于北师大

目 录

序一	刘家和
序二	郭小凌
绪论：“本末”问题的由来	1
第一章 “本末观”产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12
第一节 工商业和城市的兴起	13
第二节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转型的性质	25
第三节 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张力	30
小结：中国和希腊社会的几点异同	37
第二章 “本末”思想的发生	42
第一节 儒家的“本末观”	43
第二节 墨家的“本末观”	56
第三节 道家的“本末观”	61
第四节 法家的“本末观”	69
第五节 古代希腊的相关经济思想	88
结论	122
第三章 “本末”与“义利”	125
第一节 儒家：“见利思义”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127
第二节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	140
第三节 道家：“至仁无亲”“至义不物”	143
第四节 法家：“利出一空”	147

2 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第五节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正义”与“利益”的关系	159
结论	173
第四章 “本末”与“公私”	179
第一节 儒家:取予有度 公私兼顾	181
第二节 墨家:“厚不外己,爱无厚薄”	185
第三节 道家:少私寡欲 至仁无亲	188
第四节 法家:动无非法 存公去私	192
第五节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围绕“公有制”问题展开的论争	205
结论	226
第五章 “本末”与人性	232
第一节 儒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234
第二节 墨家:“亏人而自利”	242
第三节 道家:“轻利而重生”	246
第四节 法家:趋利避害	249
第五节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人性	258
结论	273
余论	279
附录一 1980 年以来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问题研究综述	283
附录二 “君子不器”辨析	300
参考书目	314
后记	325

绪 论

“本末”问题的由来

一、概念的界定

所谓“经济思想”，即“任何特定时间，任何特定社会中流行的对于经济事务的意见”。^①“本”和“末”原指事物的根本和支末，由于战国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念，“本”与“末”遂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特定范畴，一般说来，“本”泛指农业，“末”泛指工商业，所谓“本末观”，其含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本末观”是指中国古代直至近代的历代思想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狭义的“本末观”是指“重农轻工商”的思想观念，^②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希腊虽然没有与中国相对应的“本”、“末”范畴，但也存在重农轻工商的经济思想，即“本末观”。

本书着重探讨“本末观”的起源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描述“本末观”在中国和希腊历史上的起源过程并分析其思想内涵；第二，挖掘其所以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根源。因此，本书仅涉及“本末观”在中国和希腊产生的时代，其时间范围大致设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第1版，第85页。

^② 参看李守庸：《本末观平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2 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定在公元前八——公元前三世纪之间,时段上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希腊的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考察的对象包括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学派和思想家。

二、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问题是上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讨论最多的史学课题之一,因为至少有三个重大理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重农抑商”,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和60、70年代曾经出现过两次讨论高潮。80年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仍然很多,而且,与此前的研究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首先,在“重农抑商”的性质和评价问题上,有些学者对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总体否定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完全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工商业在古代的作用,“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封建社会前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从而形成了“总体否定”、“总体肯定”和“肯否参半”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第二,传统上认为“重农抑商”问题为古代中国所独有的看法被突破,学者们通过比较研究,把这个问题放入世界历史的大范围里进行考察,得出,“重农抑商”并非为中国古代所独有,而是一种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包括古代希腊)某种程度上曾经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①看来,如何全面、客观与合理地评价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依然是一个有待

① 详见附录拙文:《19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问题研究综述》。

深入研究的课题。

无独有偶,与中国学者关于重农抑商问题的讨论几乎同步进行的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古代希腊罗马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其中心问题是古代希腊是“农业文明”还是“工商业文明”。大致说来,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工商业文明说”占统治地位,60年代以后,“农业文明说”则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①这场论争开始于19世纪末,历时近百年,目前虽然取得了大体一致的意见,但是,应该说,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结束。1992年出版的新版《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五卷中,著名史家戴维斯(J. K. Davies)在“社会与经济”一章中,在总结了70年代以来以芬利(M. I. Finley)^②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全面反思之后,又介绍了此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新进展,最后指出:“直到本卷的出版,关于古代经济与社会‘模式建造’(mode-building)的争论看来还在继续进行,今后可能在论述的方式上还会出现较大的变动。所以,这里所写的是十分具有暂时性的。”^③

① 关于这一论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详见郭小凌:《是工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古希腊史问题浅论》,载《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在肯定了“农业文明说”的总体合理性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对于古希腊的工商业,“夸大它的功效固然不妥,低估它的作用也有悖史实。在这方面,芬利等人的看法也有过分之处。事实上,自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纯粹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便不复存在,相互依存的农工商混合经济便永久性地产生出来。”笔者认为这一论述是有道理的。另外,晏绍祥在其近著《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中对西方学界一百多年来对该问题的论争也有详细的述评,并介绍了一些国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因此,如何在农业文明的大前提下研究工商业在古希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十分必要。

② 代表作《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③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 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88.